

中欧领导人今天举行正式会晤

会晤厅墙上挂“钟山竞秀”，桌上摆再生纸笔

今天,第十二次中欧领导人峰会将在南京正式举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将与欧盟轮值主席国瑞典首相赖因费尔特、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共同主持。会晤后,中欧领导人将出席双方在科技、经贸、环保、工业等领域合作文件签字仪式,并共同会见中外记者。

峰会期间,金陵会议中心无疑是最大的焦点。记者昨日了解到,作为中欧首脑会晤的主会场,1300平方米的钟山厅在布置上作了很大调整,签约仪式所用的会议室陈设也做了重新布置。当然,最吸引人的,还有中午在这里举行的国宴。



中欧首脑今天将在金陵会议中心钟山厅会晤。 资料图片

大师创作“钟山竞秀”山水画

本次峰会是在南京乃至江苏省举行的最高规格的外事活动,也是今年下半年我国重要的外事活动之一。据悉,所有接待场所都是根据外交部提出的要求严格落实布置的,并多次对细节进行调整以求达到最佳效果。

钟山厅内墙面原有的木质浮雕荷叶图,已经换上了由江苏省知名山水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秦剑铭的一幅名为“钟山竞秀”的山水画,展现了南京独有的秀丽钟山美景及明城墙的悠久文化韵味。据相关部门介绍,这幅画是秦先生为领导人合影特意创作作为背景使用的。

会场正中,长20米的会晤桌及真皮椅子是金陵会议中心总经理带领相关部门领导赴北京参观调研后,按照人民大会堂的标准原材原尺寸定制的,美观大气。

作为签约仪式及新闻发布会的三楼会议室,会场台型经过了反复调整。签字台得体大气,深蓝色的桌套是选用上等布料制作而成,按照外交部要求将面台与桌裙做成整体桌套套住签约台,替代以往用桌卡固定桌裙的布置方式。

此外,从灯光的强弱和角度到中、瑞、欧盟三国旗帜的位置包括鲜花绿植的高度位置都严格按照外交部要求进行布置并反复调整直到全部符合标准。

桌面摆上再生纸笔

在会晤厅的桌子上,提供的全部是再生铅笔,纸张也是再生纸。这些细节,正好贴合本次峰会倡导节能减排、发展“绿色经济”的主旨。本次峰会期间,欧盟还将特地在南京举行一场气候展,“从小处做起”同样是节能减排的重要渠道。其次,为了使会场内的空气质量更好,金陵会议中心在几天前就打开了会场所有通风系统,并且购买了活性炭去除杂味净化空气。

当然,南京作为六朝古

都,本次峰会在此举行,无疑有助于进一步体现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会场的两边,摆放了从南京博物院及爱涛艺术馆调来的12件文物,展现了西汉、西晋、明朝、清朝等不同朝代的文化风貌。

国宴有“芦蒿金鱼饺”

中午的国宴设在近400平方米扬子宴会厅。宴会厅内设有一张十多人的长条主桌以及数张圆形副桌。金陵饭店集团公司、金陵酒店管理公司的领导及专家多次赶赴现场,对宴会厅的色调及布置提出意见并给予指导。在华丽的金色主色调下,长条主桌选用红金色底台白色面台,配以金色花边欧式座椅,贵气高雅,桌面的鲜花错落摆层次鲜明。副桌的椅子采用象牙白色椅套并用红色流苏装饰物的中国元素加以点缀,淡雅却不失韵味。选择的餐具也都和整体布置相匹配,采用银色丝线花纹的水晶餐盘。

国宴到底吃些什么呢?记者了解到,菜单极富中国特色,并且充分体现南京口味:瑶柱炖素珍、南瓜杏仁虾、蟹粉狮子头、红花焗鳊鱼等,其中一道点心是芦蒿金鱼饺,选料南京特有的乡村野素,清香十足,好比一条活灵活现的金鱼……

快报记者 郑春平
通讯员 张闻



欧盟主席巴罗佐(左)、瑞典首相赖因费尔特(右)先后抵达南京索菲特银大酒店。 快报记者 赵杰 摄

今天早餐既不挑剔也不特殊 欧方首脑选择快捷西餐

将在今天与温家宝总理会晤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于昨天中午抵达南京,而瑞典首相赖因费尔特则是昨晚连夜赶到的。他们全都入住顶级奢华酒店——南京索菲特银大酒店。这也是该酒店自开业来第一次在同一时间接待两位元首级贵宾。

巴罗佐、赖因费尔特一行下榻的是索菲特酒店的行政楼层,酒店所有行政套房拥有南京最先进的设备设施。在连通房内还备有健身器材和瑜伽垫,一边锻炼一边还可以通

过落地大玻璃窗眺望长江、紫金山和玄武湖。

不过,今天的早餐充分体现了两位元首级政要平常、低调的作风。今天他们都不约而同选择在酒店西餐厅和其他客人一样用早餐。所选西式套餐菜单内容有:前菜是烟熏三文鱼和马鲛、意大利沙拉米肠配生菜。主食有酒店自制的瑞士冻麦片、酸奶布丁配新鲜法式吐司及蓝莓酱、水波蛋配班尼汁,还有水果盘。

快报记者 郑春平

三鹿赔偿应有个“阳光方案”

在这个因风雪而酷寒的周末,读到一则陡然间让人更觉酷寒的消息:三鹿公司破产程序已由石家庄中院裁定终结,结石奶粉赔偿事件被画上了句号,结石患儿将无法从三鹿获得任何赔偿。

(11月29日《广州日报》)

据悉,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按照破产法的规定,企业破产后的清偿要按照一定顺序进行,即先支付破产费用,其次偿还员工的工资和社保,此后是抵押债权,最后才涉及偿还普通债务。由于对结石患儿的赔偿被列入了“普通债务”,所以也就随着三鹿的财

产用尽而不得不“不了了之”——除非三鹿复产有了偿还能力。

即便不纠缠法律概念,从最基本的常识上看,也并不难理清,三鹿公司和结石患儿之间的关系,是加害者和受害者的关系,即便这种加害行为并非有意。既然如此,将受害患儿的医疗和赔偿费用视作和其它债务类同,应是十分不妥当的——因为这些赔偿,对某些患儿来说很可能是“救命钱”,可以让他们获得更好的治疗,没有的话可能会耽误治疗,进而影响到一生的健康——“救命钱”当然应该优先发放,

否则便是对“以人为本”这一社会文明公则的悖逆。所以,“结石患儿将无法从三鹿获得任何赔偿”,是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最坏结果。

而和这一坏结果同样难以令人接受的,是公众获悉该结果的途径——这竟然只是通过一桩诉讼“顺便带出来”的一则消息:11月27日,首起结石患儿状告三鹿讨要赔偿的案件正式在法院开庭审理时,三鹿代理人向法院出具了一份石家庄中院11月20日作出的裁定书,表明三鹿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已经完成,并于当日起生效。

20日三鹿财产便已“归零”,27日才开审首起索赔案件——按有关方面的解释,其实此时审不审已经无所谓了,因为结果已经“被确定”,患儿方赢了也白赢,只不过得到一张“法律白条”而已。如此局面,简直令人怀疑这是否是一个设定好的“忽悠”程序。

以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的巨大影响计,对结石患儿怎么赔、赔多少或赔不赔,显然应该有个“阳光方案”,对无论怎样的结果,都应该有个权威、阳光的解释。无论如何,躲着、耗着、藏着、掖着不是明智的做法。

(凝望)

“政府注资男同酒吧”被误读的背后

■热点纵论

12月1日又将迎来“世界艾滋病日”,媒体上有关艾滋病的报道也空前多了起来。其中,大理市政府参与投资建设一家同性恋酒吧的消息,尤为引人关注。据11月29日《新京报》报道,由云南大理市卫生局出资、10多名防艾志愿者负责经营的以同性恋为主体顾客的吧即将正式营业,卫生局和志愿者们计划通过酒吧的平台对更多潜在的艾滋病患者进行“同伴教育”。

虽然大理卫生局已经解释得很清楚——“注资男同酒吧只为防艾”,但这一新鲜做法仍然备受争议。有人认为有政府鼓励同性恋之嫌,言语之中多有对同性恋的严重歧视,更有人斥之为浪费纳税人的钱。而在在我看来,相比于一些地方防艾宣传老一“套”(在

公共场合发放安全套)的做法,大理市的做法不仅在态度上更为积极,在方法上显然也更对路。

来自卫生部的数据显示,性传播已经成为我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尤其是同性性行为,它所引起的艾滋病传播已经占到传播总数的32%。导致艾滋病传播的同性性行为,绝大多数来自男同性恋者之间。在男同性恋中,感染率已经达到了5.9%。男同性恋显然应是引起高度关注的防艾重点之一。

而政府力量在防控艾滋病上,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短板——很难走近目标人群。比如男同,政府主导的防艾,实际很难找到他们,更难走近他们,无法真正达到防艾宣传教育的效果。与之相比,由大多原本就是圈内中人的志愿者,组织发起的民间组织在这方面优势十分明显。大理

向民间组织注资,帮助他们开展更有效的“同伴教育”,总体思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至于在具体操作方式上,有无必要搭建同性恋酒吧这样一个平台,因各地具体情况而异,如果能有其他方法找到并聚拢目标人群,也不一定非建酒吧不可。

真正值得关注的倒不是“同性恋酒吧”本身,而在于由此衍生的两个问题:一是政府防艾基金的使用,二是在“政府主导”的防艾模式下民间组织的边缘化。大理卫生局注资民间组织的钱,是从当地每年大概80万左右的防艾基金里拿出的。我想,这样的防艾基金各地卫生部门应该也都有,那么这笔钱一般都是被怎么花掉的,又具体产生了怎样的防艾效果?会不会也像其他资金项目一样存在“艾滋腐败”?

虽然每到“世界艾滋病

日”,我们总能看到政府主导的一些防艾活动,但是在“政府主导”之外,对民间组织在防艾力量中的重要作用,目前认识显然还不够。民间组织大多被边缘化,很难寻到一个合法的身份,更遑论得到政府部门的资金支持。因为对民间组织防艾作用的忽视,很多“政府主导”的防艾活动始终漂浮在表面上,难以深入真正的目标人群,以至于在公共场合发放安全套至今仍是重要的“保留节目”。

防艾在价值上的重要性和时间上的紧迫性皆已无需赘言。而“政府注资男同酒吧”之所以能成为争议新闻,某种意义上不能不说,背后反映的其实是防艾工作尚远远未能深入开展的虚浮局面。(盛翔)

本版邮箱:
wfwcbxyh@vip.sohu.net

“被小康”背后是权利的贫困

为了创建小康而热火朝天的江都,被一篇网帖泼了一头冷水。网帖直指江都的小康调查造假,称为了应对12月中下旬将进行的小康电话随访,江都有关部门为老百姓准备了“建议答案”,引导老百姓作出“是”的回答。

(11月29日《现代快报》)

发生“被小康”事件,已经不止一次了,为什么还会层出不穷,明知故犯?为何权力总是这么傲慢和霸道?为何权利总是受伤和痛楚?在江都这个小康事件中,我们需要从两方面看。

一方面这凸显了权力对上负责的本能。应该说,省定的“只有60%以上接受电话访谈的居民认可小康”,原本是引入民意,增加民意判决和考

核,但好经被下面念歪了,江都之所以操纵民意,正是因为为了对上负责,取悦于上。由于不需要对下负责,老百姓满意不满意,就无所谓了,只要数据好看,通过小康验收,就能继续稳坐官员并有晋升可能。

另一方面则映射出权利贫困和无力。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被小康的丑闻之所以被发现,是在多个网络论坛被揭曝的,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一个很惨淡的事实,当地老百姓尽管不满,但也无可奈何,他们不敢直接抗衡,只能求助于网络(有时还面临被跨省追捕),期待引起公众关注。如果权力足够谦抑的话,他们就不需要求助于网络了。(王石川)

出口油价“一般人告诉他”?

针对媒体关于“今年1~8月国内成品油平均出口价为2.4元/升”的报道,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首席分析师周若洪、新财富首席分析师殷敬东表示,这种话严重误导了舆论和消费者。

(11月29日《广州日报》)

有一事不明:中石化的专家为什么在解释内情的同时,不撇除那些加工油、低价油因素,算上国内税费等问题,直接向舆论讲清楚出口成品油的价格?考虑到不同时间和税率问题,分几个时段公布一二,给“被点燃”的舆论怒火来个扬汤止沸也好呀。要知道,解释、驳斥一万句,抵不上直接报告一个时段的出口油价啊!

更具戏剧性的是,揭批“贱卖论”的专家,或说“对海关数据进行合理分类统

计才能得出正确结论”,或说“(国内外油价)两者不具可比性”,就是不肯吐露出口油价的具体情况,更是将舆论引进了“迷魂阵”——那些内部掌握的数据,谁能全部拿到并计算?这些“专家”自己是业内人士却不做此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已经证明了一些公众的猜测。

舆论与中石化专家对阵的“口水”喷得比油少,但就是整不出个出口油的价格来。既然出口油价“一般人告诉他”,国资委、发改委、国务院这些“不一般人”能否出面调查,将事件的真相弄出来,给全国人民一个交待?请告诉我们出口油价到底是多少,这个要求不过分吧?难道是怕暴露在国内市场上的暴利吗?

(成彪)